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三五

全面抗戰前的 中日關係

(1931-1936) 李君山 著



文史哲大系 235
李君山 著

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 / 李君山
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 2010.01
面；公分. -- (文史哲大系；235)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668-906-2(平裝)

1. 中日關係 2. 外交史

643.142

98024802

文史哲大系 ㉓

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
(1931~1936)

著 作 者：李 君 山
發 行 人：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 址：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02)23636464 傳 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2010 年 1 月一刷 新台幣 600 元

ISBN 978-957-668-906-2

前言

壹、主題界定與章節介紹

本書《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所預備處理者，是自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變」爆發，至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變」前夕，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日本「大陸政策」與其閩外軍人（關東軍、華北駐屯軍）蠢動，所採行的各項政策與應變措施，尤其著重「外交／內政」「中央／地方」「派系／人事」「政策／執行」等層面的關係與糾葛。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套用在這段時期的中日關係，誠屬箴言。所以本書毋寧是將多數篇幅置於中國內部之爭論，探討在日本壓力與滲透下，國府如何制定政策？政策執行又如何受到扭曲？派系人事如何「內交」互動？乃至地方勢力如何藉以「制衡」中央等等。嘗試說明這些內政因素，實際都曾在這一主題上，充當了重要的催化劑或醞酵劑；國府對日政策的未能貫徹、乃至外交執行上的節節失利，除了雙方國力的差距外，中國本身內政上的缺陷，也是需要加以考察者。

自九一八至西安事變，超過 5 年的時間，不論是就「多事之秋」的歷史進程、或就單純的歷史寫作而言，都屬一相對漫長的階段。因此本篇「前言」的主旨，乃在展卷之前，就整個主題範圍，進行一番鳥瞰；同時為本書作一導論，說明各章所設定的子題，及讀者值得擷取的重點，以方便接續的閱讀查詢等。

首先，如以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為綱，這 5 年約可分為 3 階段：

第 1 階段係為九一八至「一二八」（1932 年 1 月）之間。南京由原先的「不抵抗」政策，歷經 4 個多月內憂外患的「嘗試錯誤」過程，而形成一青黃不接的「政策空窗期」。直待 1932 年 1 月蔣中正

（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汪兆銘（行政院長）重新合作，加上上海 19 路軍「意外」的抵抗，才漸次站穩腳跟，脫離政策上的困境。

第 2 階段係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約由一二八至「河北事件」（1935 年 5 月），歷時 3 年有奇。世論之於此策，往往僅限上海、長城兩次「熱戰」的進行；實則顧名思義，其應具有某種「雙面」的性格。就層級分，中央既有汪兆銘一系，對日作出種種「親善」宣示（＝交涉），又有蔣的積極籌劃軍事佈署（＝抵抗）。另外，華北既有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下稱「軍分會」）、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下稱「政整會」）兩會的設立，持續進行各項《塘沽協定》（1933 年 5 月）善後談判（＝交涉）；又有國民黨黨部、軍方（如「藍衣社」）鋤奸偵防的地下活動（＝抵抗）。凡此，均屬「雙面」政策下，國府軟硬兩手的交互運用。然也因此，終招日本軍人的忌恨，而有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的相繼發生。

第 3 階段係為國府備戰階段，以河北事件作分水嶺，迄於 1937 年 7 月「七七事變」，為時兩年，兩國焦點已轉入華北控制權之爭。儘管表面上，蔣仍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舊軌，實則「交涉」上已寸步不讓，檯面下卻一意朝「抵抗」邁進，明顯由「安內」轉向「攘外」。與此相應，就是原先主導對日工作的南京「和平派」逐漸失勢，以及「廣田三原則」（1935 年 10 月）、「國交調整」談判的曠日廢時。中日危機如滾雪球，以重力加速度發展，至 1936 年 8 月而有「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之併發，一度使蔣瀕於全面開戰的臨界點。只因西安事變突起，才讓備戰的腳步暫時放緩；但翌年盧溝橋槍聲一響，雙方已都有軍事冒險的充分動機。

由此，本書共分 10 章，第 1 階段 3 章（第 1 至第 3 章），著重國府的政策制定，包括對於九一八前「不抵抗」政策的分析（第 1 章），強調自 1928 年 5 月「濟南事變」的對日、1929 年 7 月「中東路事件」的對俄，「不抵抗」做為固定的反制模式，實際有跡可尋。另外，九一八至一二八間「政策空窗期」的詮釋（第 2 章），此一時期毋寧為國府「嘗試錯誤」的過程，因此政策選項（alternative）的分

析，應該包含決策者「爲」與「不爲」（inaction）的各色考慮。最後是一二八階段「雙面」政策的研究（第3章），可以發現國府各派系在決策溝通上，經常顯得迂迴而反覆，充滿著各樣虛與委蛇、兩面爲人的矛盾和混亂。惟日後「雙面」政策各要件，如「戰而後和」模式、「有限戰爭」原則、「直接交涉」建立，乃至停戰協定的定位等，經此役都已形成某種慣例（conventions）或典則（norms）。

第2階段4章（第4至第7章），則屬於戰前中日關係稍形緩和的時期，南京和平派與華北兩會相對活躍，故論述集中於國府「雙面」政策的執行，包括日軍侵入華北的起點，1933年熱河及長城戰役（第4章）；兩會體制的初期表現，簽訂塘沽協定和解決「察馮事件」（第5章）；兩會體制的高潮階段，即關內外「通車」與「通郵」談判之進行（第6章）；兩會體制的由盛轉衰，1935年5月以後繼起之河北事件及「張北事件」（第7章）等。

第3階段3章（第8至第10章），探討1935年7月《何梅協定》既成，華北危機深化，蔣中正逐步走向前台，「雙面」政策朝「抵抗」「攘外」傾斜的過程。何梅協定所造成的後續效應，一爲華北軍系的失衡，使宋哲元29軍得以乘勢崛起，遂有10月以後「華北自治」運動與12月「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出現（第8章）。二爲國府內部和平派的沒落，儘管7、8月間汪兆銘等曾致力於中日外交重整，然因日本方面負責無人、加上蔣的態度硬化，蔣汪合作終究在12月走到了盡頭（第9章）。於是接下來1936一整年，蔣一意備戰，日軍也積極壓迫華北「共同防共」。8月成都、北海事件接連爆發，雖使中斷已久的國交調整談判，由新任外長張群、駐華日使川越茂廣續進行；但蔣堅信日人投機，「意在不戰而取利」，幾令雙方於9月全面攤牌（第10章）。稍後西安事變一度轉移了焦點，惟越明（1937）年，更危險的「戰爭邊緣」考驗已經等在前頭。

貳、內容特色與課題發展

平心而論，有關戰前中日關係的專書，業已汗牛充棟，然則本書有何特色？閱讀者和研究者可以從中獲得什麼？或者從某種「科學」的角度來說，重建各項人事地物間的「連結」，本來就是歷史寫作的重要任務，那麼本書又能給接下來的民國史——而非僅僅中日關係史——的解釋，帶來什麼樣「橫向」的連結及「問題意識」？這或許是在全書卷首，筆者需要解答的問題。

本書最重要的材料，多數來自臺北國史館所庋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即原「大溪檔案」），尤其箇中《特交檔案·分類資料》「中日戰爭」之部，及《特交文電·日寇侵略之部》各卷。其特色皆為當年各方呈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文電或函件，內容乃係未經修裁的原始報告，而有別於同屬該檔的《事略稿本》或《困勉記》，故牽涉範圍常不限於對日事務，甚至多有告發他人的密件，適正凸顯蔣轄下各部各派的矛盾和分歧。對於中日關係以外，民國史上各項人事地物「橫向連結」的建立，可有重要的啟發。

寫作期間，筆者抄錄了蔣檔超過兩千件的函電，很自然面對到一項疑問：這部作品是否僅僅「後出轉精」，比起前輩，就是占了資料開放的便宜？或者只是在眾所周知的解釋或輪廓之上，添加更確定的證據而已？檔案的瀚海中，吾人如何避免染上所謂「史料學派」為人詬病的痼疾，即只重視新材料的挖掘，卻缺乏思考和宏觀的高度？

考慮及此，筆者遂欲以一導讀，扼要說明各章所提出的問題，與其可能的橫向連結。如第1章「不抵抗政策的失敗——由濟南事變到九一八」主要是將不抵抗視為國府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個「階段」（1928年5月—1931年10月），而非九一八當日的某種「偶然」。該階段實際上接「革命外交」（1924年1月—1928年5月），聲稱不抵抗並非對外示弱，「忍耐堅定」反而是一種以小搏大、與革命外交相配合的手段。所以包括濟南與中東路兩案，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制式反應，這是研究該「階段」民國外交，所可共同注意者。

第2章「由不抵抗到抵抗——國府因應九一八之決策過程」探討的是九一八至翌年一二八，4個多月間南京「政策空窗期」的現象。

事實上，較諸濟南及中東路兩案，濟案爆發於 1928 年 5 月 3 日，至 7 月 17 日東京命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開始交涉，為時亦有兩個半月；至次年 3 月 28 日簽字，凡歷 8 個月又 11 天。中東案更為曲折，自 1929 年 7 月 19 日蘇軍砲擊綏芬河，12 月 22 日東北當局代表蔡運升始簽《伯力議定書》，耗時已 5 個月；惟議定書稍後又遭南京否認，延至翌年 2 月改派莫德惠，5 月赴俄京重新談判，終因九一八而成懸案。故曰「政策空窗期」乃國府猶豫和等待的必要過程，似不為過；之所以動盪與怠誤若彼，實受制於日本軍人的失控，及中國「寧粵之爭」的擴大，而總結為「迴避交涉」的失策。內政因素影響外交，以這段期間最為顯著，研究國民黨黨爭者，可多留意於此。

第 3 章「一二八與國府政策之轉變」雖以 1932 年淞滬之役為主題，實際分析的是國府派系政治的決策過程，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要件。國府派系之積重難返，世所周知，故重大決策恆需各派先有共識（consensus），才能杜絕可能的內部衝突。滬戰期間，洛陽（汪兆銘）、南京（蔣中正）和上海（19 路軍或粵派中委）3 地的議論橫生、言行紛歧，說明了「雙面」政策在該時仍缺乏共識。而一二八的最後結局，有類今日吾人所謂「有限戰爭」（Limited war），則已預告「雙面」政策「談談打打」「且戰且和」的局部抵抗性格，將成為接下來 5 年多，中日衝突的標準模式。

第 4 章「華北危機的起始——熱河失守與長城戰役」處理的是 1933 年春夏交際的中日之戰。華北做為國府歷史成敗的致命傷之一，在於南京始終苦於「夾裝無人」；首都南遷後，中央以江浙從龍之士為核心的政治現實，更易成為「北人／南人」地域偏見醞釀的溫床。故 1930 年中原大戰後，只能籠絡東北軍以箝制各軍；九一八後蔣中正百般迴護張學良，部分原因亦在此。然東北軍內部複雜，不僅有「老派」「新派」之分，張作霖死後，所遺耆老宿將又與少帥派不合。而原受箝制之各軍，如宋哲元 29 軍、閻錫山晉綏軍，皆各存芥蒂。故欲論中日危機，需由南京政權的地域性格、及華北民心的疏離著手，始能明其內在脈絡。

第 5 章「塘沽協定與察馮事件——兩會體制之初期階段」起，筆者將 1933 年 3 月 12 日由何應欽接替張學良的北平軍分會，及 5 月 3 日成立的政整會，合稱「兩會體制」；並將其運作分爲 3 期，初期約自 1933 年 5 月至 8 月，任務除了簽訂塘沽協定外，概以「鎮撫反側」爲重點，尤其馮玉祥標榜抗日的「察馮事件」。關於察事，筆者係由「雜軍」的角度加以分析。雜軍是比「雜牌軍」更等而下之，屬於亦兵亦匪的非法武裝，由於歷年戰亂，華北殘存尤多，馮遂欲湊合成軍。然因雜軍「傭兵」惡性難改，很快演成「將（馮）隨兵（雜軍）轉」的尷尬局面，馮乃不得不中途離隊。故察事成敗，實與抗日牽涉較少，而與軍閥政治（militarism）特性有關。甚至隨著日本勢力深入中國，若干雜軍也轉成日系偽軍，爲日、偽作前驅。

第 6 章「關內外通車、通郵交涉——兩會體制之高潮階段」係介紹兩會運作的第 2 期，始自 1933 年 8 月，止於 1935 年 1 月。期間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是活動重心，專力與日人解決塘沽協定各善後問題，包括關內外通車、通郵、通航等。三通談判的意義之一，就是配合國際聯盟圍堵「滿洲國」的一環。國府顧及日本在華，已全憑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自由辦理，爲了考慮對口單位的有效性與對等性，因此有了兩會體制的「白手套」設計，表面屬於地方單位，以與關東軍位階相侔。同時鑒於日本施壓、國際無援、且自身乏力，只能戰戰兢兢，在國際共守的「不承認主義」規範下，制訂談判原則；並成立各種「民間」機構，擔負通車、通郵業務，迴避與滿洲國官方接觸；經手的各項協定也堅持爲「臨時」「善後」性質，以免造成國與國正式條約的印象，誤使現狀永久化。凡此，借古觀今，都還容易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第 7 章「由親善到變局——兩會體制的困境與鬆動」則探討兩會運作的第 3 期，即由 1935 年 1 月黃郛南下不再北返，至 8 月政整會撤銷、12 月軍分會結束，全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取代爲止。總結兩會困境，一在日人意欲「分而治之」，故南京需要一「緩衝政權」維護華北，類如蘇聯在 1920 年扶植的「遠東共和國」（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表面保持獨立，實則「心心相印」，然此非代表中央的兩會所能勝任。二在「雙面」政策的軟硬兩手間，有其根本矛盾。當兩會致力安撫日人的同時，國民黨部、軍方或「藍衣社」卻四出鋤奸，河北事件終告授人以柄。三在華北原由東北軍箝制各軍，張學良去職、兩會進駐後，遂又成東北軍與兩會的抗衡。兩會所恃，僅中央軍留駐河北兩師，及掌握北平治安的蔣中正侄兒、憲兵團長蔣孝先而已。一旦彼等被迫南撤，兩會自然難以爲繼，此亦足徵日軍對於國府內情之瞭若指掌。

第 8 章「華北自治運動——由華北軍系失衡至冀察政委會出現」強調的是 1935 年 5 月河北事件至年底冀察政委會成立的過程。所謂華北自治運動，相當程度反映了 1930 年代中日關係的特殊性。由於日方長期的經營滲透，其與華北各重要派系，從舊北洋系、東北軍、晉綏軍到西北軍，都有綿密而錯綜的聯繫；相較於南京中央「夾袋無人」，一味透過各軍相互箝制的窘境，實成攻守之異勢。於是日本對中國的國際霸權壓力，乃與中國內部的地方主義、地盤主義結合，形成各地分離運動背後的重要推手。世論於茲，多著重「中國通」如土肥原賢二等的角色；惟筆者觀點，中國在地軍人，既不完全唯南京之命是從，也非日本帝國主義傀儡；彼輩固曾使中國中央政府感到棘手，相信也令日本少壯軍人困擾萬分。冀察政委會較諸兩會，儼然構成更徹底的「緩衝政權」，1937 年的七七事變，乃又轉以此僵局爲背景也。

第 9 章「南京和平派的沒落——兼論蔣汪合作之結束」說明的是華北危機深刻化後，相應於華北兩會撤銷，活躍一時的南京和平派也走向沒落的道路。其中 1935 年 6 月底汪兆銘離京赴滬「醫病」，可謂第一幕。接著 7、8 月間外交重整的中挫，係其第二幕，證明了日本軍部之不易與。及迨 10 月下旬中日通航的臨時拒簽，又係其第三幕，完全暴露了和平派無力、與蔣中正不再退讓的真意。最後 11 月中國國民黨第 5 次全國代表大會揭幕，12 月蔣出而組閣，則爲其第四幕，對日陣容的嬗變，透露了和平派之邊緣化已成定局。其中，中日

通航係蔣、汪分歧的重點，也最能反映出日本在 1930 年代遭各國「圍堵」的實況。緣因當時的科技、航程，以及北阻於蘇聯等因素，日本的國際航線需由中國通過；然至 1935 年，蔣已決意倚靠英、美、蘇及國聯等，來對抗日本，所以一方面在華南與英美法航線接軌，一方面則堅拒日本開闢華北、華中航線，而形成中日空權之爭，亦為戰前兩國重大懸案之一。

第 10 章「從安內到攘外——1936 年的中日關係」敘述的是西安事變前，中日國交調整的最後一程。這 1 年隨著蔣中正走向台前，中國「聯俄制日」態勢日趨明朗，雙方焦點已轉移至中國「聯俄」「聯日」的歧途之爭。至於談判策略，也都各有「二重外交」或「二元作法」的打算。日本促談目的，既在掩護華北自治運動，也為反制中蘇親善，外交、軍事軟硬兼施。中國方面，則「安內攘外」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背後，一貫的脈絡還是「談談打打」的雙面策略，以交涉來掩護安內、以安內來準備攘外；總綰其間的，自屬蔣中正一人。尤其 1936 年 8 月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後，蔣已認定日軍只想不戰而勝，以免損及它將來南進或北進的籌碼，故不惜以武力反制日人「不勞而獲」的想法；甚且屢以「戰爭邊緣」的壓力，來試探日方所願忍受的底線。中日關係遂如重力加速度，向翌年的全面開戰邁進。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不抵抗」政策的失敗——由濟南事變到九一八	1
第一節 「不抵抗」作為「政策」	1
第二節 「不抵抗」政策的形成	5
第三節 「不抵抗」政策的內容	11
第四節 「不抵抗」政策的失敗	20
第五節 「不抵抗」政策的結束	28
第二章 由「不抵抗」到抵抗	
——國府因應九一八之決策過程	32
第一節 前 言	32
第二節 「不抵抗」政策時期	36
第三節 事變擴大時期	45
第四節 孫科主政時期	52
第三章 「一二八」與國府政策之轉變	66
第一節 前 言	66
第二節 國府應變的決策過程	71
第三節 國府政策的轉變	93
第四章 華北危機的起始——熱河失守與長城戰役	108
第一節 前言暨背景	108
第二節 熱河備戰的紛擾	115
第三節 熱河失守與華北易帥	125
第四節 長城戰役與雙面政策	138

第五節	長城戰役之高潮·····	145
第五章	《塘沽協定》與「察馮事件」 ——兩會體制之初期階段·····	158
第一節	前 言·····	158
第二節	戰役期間的和平努力·····	160
第三節	黃郛北上與對日重組·····	169
第四節	察事醞釀與中央處置·····	176
第五節	馮之再起與察事爆發·····	184
第六節	南京對策與事件落幕·····	193
第六章	關內外「通車」「通郵」交涉 ——兩會體制之高潮階段·····	201
第一節	前 言·····	201
第二節	通車背景與初期談判·····	205
第三節	北平會談與通車延宕·····	214
第四節	通郵緣起與國聯決議·····	225
第五節	通郵談判的展開·····	235
第六節	通郵的最後妥協·····	247
第七章	由親善到變局——兩會體制的困境與鬆動·····	262
第一節	風雨前的寧靜·····	262
第二節	兩會體制與緩衝政權·····	269
第三節	兩會體制走向瓦解·····	280
第四節	河北事件之挫折·····	294
第五節	張北事件之懸疑·····	313
第八章	華北自治運動 ——由華北軍系失衡至冀察政委會出現·····	324
第一節	何梅協定後之變局·····	324
第二節	自治運動之醞釀·····	336

第三節 自治運動第1階段·····	346
第四節 自治運動第2階段·····	357
第五節 自治運動最後階段·····	369
第九章 南京和平派的沒落——兼論「蔣汪合作」之結束··	382
第一節 1935年前之蔣汪合作·····	382
第二節 汪兆銘辭職赴滬·····	393
第三節 何梅協定後的外交重整·····	403
第四節 中日通航談判·····	416
第五節 蔣汪合作之短暫重建·····	431
第十章 從安內到攘外——1936年的中日關係·····	447
第一節 「國交調整」的努力·····	447
第二節 成都事件與北海事件·····	462
第三節 全面戰爭的前奏·····	483
第四節 張一川越會談的結束·····	493
結 論·····	510
徵引及參考書目·····	517

表 次

表 3.1：胡宗南第 1 師調遣紀錄.....	84
表 5.1：「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之結構.....	189
表 6.1：《通郵會商步驟》.....	234
表 6.2：《國聯決議案》之歧見.....	237
表 6.3：通郵談判第 1 階段進度	239
表 6.4：通郵談判第 2 階段進度.....	241
表 6.5：通郵談判第 2 階段僵局.....	244
表 6.6：通郵談判第 3 階段進度	250
表 6.7：通郵談判定案階段進度.....	253
表 8.1：1935 下半年華北各級人事異動表.....	331
表 9.1：通航談判 7 月進度	426
表 9.2：通航談判 8 月進度	428
表 9.3：南京答覆廣田三原則之各案	437
表 10.1：張群—有田八郎會談結論.....	457
表 10.2：張一川越首次會談議題	469
表 10.3：張一川越第 2、3 次會各案.....	473
表 10.4：華北通航最後案暨修改意見.....	476
表 10.5：滬岡通航各方意見.....	480
表 10.6：張一川越第 2 階段會談議題.....	495

第一章 「不抵抗」政策的失敗

——由濟南事變到九一八

第一節 「不抵抗」作為「政策」

壹、是否「政策」之議

「不抵抗」，在抗戰前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上，始終是一相當混淆的名詞。包括它是否成爲一種「政策」？它的形成過程？內容與範圍？挫折與結束？乃至誰該爲它負責？無一不是聚訟紛紜的課題。尤其中共方面的定調，更將「九一八」的發生與東北的淪陷，全面歸咎於斯。大陸學者易顯石在《九一八事變史》中就總結說：

可以說，九一八事變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招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實行不抵抗政策，又斷送了東北大好河山。¹

所以本章將首先從「政策」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九一八前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關係中，所謂「不抵抗」的問題；並進一步嘗試對這段歷史，提供某些新的詮釋。

事實上，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日本關東軍預備發動事變，已經

¹ 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等著，《九一八事變史》（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2月，臺北翻版），頁185。

是公開的「秘密」。²甚至就在9月18日當天，北平《晨報》還刊出社論，警告當局，對於日人強硬言論「決不可以隨便談話視之」：

蓋日本自經日俄一戰之後，人人皆知「滿蒙」之名，以此煽動，最易收效。……日前更利用飛機散佈排華傳單，甚且捏造華人排日事實，意在激起事變，用為擴軍之口實。……而野心者流，竟謂「中國人不特排日，實係侮日」，無非欲以最富刺激性之言辭，推進日本民眾仇華之心理。此類用意，皆有背景，決不可以隨便談話視之。在此環境之下，我之對彼，非有計劃，不足以謀自衛。人之謀我既如是迫切，我之對人豈容疏忽？舉國合作對外、與統籌全局之整個方案，乃我國今日所最需要之兩大問題也。³

然而，國府決策階層最後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卻是在關東軍侵攻瀋陽及近郊「北大營」時，「絕對抱不抵抗主義」⁴。以致旦夕之間，安東、營口、長春、鳳凰城等地，均隨瀋陽之後，落入關東軍之手，「我軍按站撤退，日軍按站占領，無殊彼此換防；直至整個東北三省，盡入敵手」。⁵

² 許多官方檔案乃至個人回憶錄，都強調了這一點。例如當時在北平張學良幕下的顧維鈞，就曾對東北局勢深感不安：「一九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時，對於日本情況感到非常不安。我並沒有什麼特別情報，但報紙上發表的東西，已把滿洲局勢的發展充分告訴了我」。顧氏曾嘗試提醒張學良，但後者似乎未加措意。見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1（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初版），頁412。

³ 〈「中村事件」與今後對日方案〉，北平《晨報》，1931年9月18日。

⁴ 9月24日張學良通知南京：「先是我方以日軍迭在北大營等處演習示威，行動異常。偶一不慎，深恐釀起事端。曾經通令各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當時日軍突如其來，殊出意外。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官方即根據前該命令，不許衝突；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見〈張學良自北平致蔣中正9月敬丑電〉（1931年9月24日），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輯34（臺北：該會印行，1964年12月，初版），頁7563。

⁵ 顏惠慶原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9月，初版），頁165。